

城事

李劲松 著

清晨，蓄积了一夜的浓雾锁住了长江，因为封航的缘故，清川大码头一派静谧，而氤氲却似一口巨锅里蒸腾的烟雾，悄悄地一步步浸没了码头上长长的台阶，始沿着城中的大道，继而弥漫向空中，终将清川城笼罩在一片白色的雾絮里，只有几幢高楼，突破了雾气的包围，像海市蜃楼的幻景，矗立在了长江北岸……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早春二月，刚过完春节。

清晨，蓄积了一夜的浓雾锁住了长江。因为封航的缘故，清川大码头一派静谧，而氤氲却似一口巨锅上蒸腾的烟雾，悄悄地一步步浸没了码头上长长的台阶，始沿着城中的大道，继而弥漫向空中，终将清川城笼罩在一片白色的薄絮里，只有几幢高楼，突破了雾气的包围，像海市蜃楼的幻景，矗立在了长江北岸。这里的冬天，年复一年地重演着大自然编排好的剧目。

太阳渐渐从长江对岸的山谷里升起，把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地，而雾中的清川县，仍是死寂。雾气覆盖不到的高处，却可以清楚地看见二十里外三清山上绛红的岩石及红色的宝塔，在蓝瓦瓦的天空下屹立，因阳光的照射更显得寥廓、苍劲。

转眼向下，便是这十丈青雾了。这座城市，夏天溽热难耐，不刮一丝丝儿风。冬天奇寒，难得有阳光光顾，凛冽的江风放肆着，像无数匹乱窜的野马。阳光下的清川，与凄风冷雨下的清川，同样的死气奄奄，就像城中还稀稀拉拉立着的不冒烟的烟囱，不带一丝儿生气。

浓雾弥漫乃是常课，清川人对这样的景象从没产生过一丝惊异之感。生活与昨天一样，没有任何走样，他们早已习惯于在这座长年沉滞于霾气的阴沉城市里过活。

清川县城，宋之后因受元人烧杀，历代废圮。现在的县城约有八十多年历史，它原不过是长江沿岸上下货的小码头之一，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沿长江大撤退，此地成了中转站，而渐至兴旺起来。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亦辗转迁至此处，随后金陵学院及金

陵医科大学也搬迁至此，带动了大量下江人来此乔居，亦来过几位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在此写书作文，办报馆，写小说，编戏剧。渐渐地，这清川的名气就大了，兼着周边发现了煤矿，小铁路修起来之后，数不清的跑码头的力夫、船工、矿工云集于此。抽洋烟提文明棍的，投机在街尾巷角跑单帮的，伤残的军人，失意的大学生，沦落风尘的女子，都蜂拥至此，因而这弹丸之地三教九流荟萃。而沿江一条街名皮货巷，名气极大，沿街均是客栈烟馆，更有数百的明妓暗娼在夜幕下招揽生意，成长江沿岸城市一景。长江上跑码头的客商，拉纤的壮男，说起此处，都异口同声，眼睛放光，饱含了向往。当时，清川城的名头很是响亮，人称“小南京”。

只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下江人回转，两所大学也跟着迁了回去，抽走了四分之一强的人口。下江人大多喝过墨水，管经营，兴文教，一旦抽走，清川便似被抽了精气，经济立见萧条，煤矿开采也因周边数县发现了更优的煤而落于人后。昔日熙熙攘攘的码头渐渐败落下来，而人口终究已麇集于此，1949年后，此地由场改为县。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有理无理，清川也学着全国各地的样，办起上百家企业。大的有玻璃厂、化肥厂、河运公司、汽修厂、磨床厂、拖拉机配件厂、洗煤厂、废品回收公司、供销社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给自足，适当外销。在计划经济时期，倒还能惨淡经营，凡上班的工人，还可保一家人糊嘴穿衣。至八十年代末，企业则纷纷土崩瓦解，绝大多数以破产收场，那些没文化、没学历、年龄又大的工人，除了岗位上那一点点开机床沙气缸扭扭螺丝螺帽的技能之外，一无所长，就像是一次涨潮被捎带着冲上沙滩的小虾小蟹，被晾晒在岸边，东张西望，凄凄惶惶。好在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在久等政府拿

说法而不可得之余，终于警醒，这才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奔东西，纷纷寻自己的生计去了。亦有完全没法找事做的，只得在社区拿低保金，守着破产时发的一两万块钱，数着铜板过日子，每日里把大把时间闲掷在就近的茶馆、麻将馆，咒骂着天地，为着麻将桌上的白板红中，拍桌子搥板凳，争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喝着粗茶，吃着淡饭，苦挨光阴。

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整座城市已拥挤不堪。清川城周边的大山上，分布着六七家三线建设时搬进来的东部大企业，操着吴侬软语，动辄二三千人，多则五六千人，早生华发，满怀着幽怨，恨青春抛却在了山沟，不管不顾，只管往城市里搬迁。

每一座塔吊的立起，意味着更多周边的农村男女，已成群结队地奔赴城市，开始他们的淘金生活。男人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晃悠着，妇人在地上拌料提灰，把儿女们扔在了大山深处。还有不少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在小巷里开苍蝇小店，或到处撬挖建筑钢筋卖钱，或进小厂打临工。姿色好些的，就在洗脚城、按摩店里打工，各自奔忙着活路。因而这清川城愈发拥挤不堪，人口密度竟超过了清川县的上级市江阳市。

阳光的力量增强了。城市在公交车站女售票员尖厉单调的喊客声和环城车急起急停的引擎声中蛰动，继而果摊上的喇叭声和音像门市的流行歌曲亦加入到了合唱中来。同心广场上最后几位晨练的老年人开始收拾刀剑，广场周边的门市传来拉卷帘门的声音，出门上班的人潮涌现了。几位老报童背着肮脏的布口袋步履蹒跚地跑来跑去，以清川人耳熟能详的沙哑声唤着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爆炸性新闻，追逐那些西装革履的中青年男人；背着一大背篋梅花的农民，推着小推车卖盐

茶鸡蛋的妇人，都齐声嚷着，给喧哗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噪声；牵着孙子的老头儿老太，警惕地看着旁边轰鸣而过，多如过江之鲫的摩托车；卖早食的贩子嘴里念经般地念着“白糕，白糕，新鲜的小白糕”，挑了箩筐从广场穿过，箩筐里用白纱布遮着白生生的白糕——一种把劣质米漂白后兑糖蒸成的一种米糕，这种糕点正好卖给那些赶时间上班的男男女女。

城市苏醒了。

卖白糕的挑子正往茶馆这边的梯道过来。

六娃子端着他那糊满了茶渍的大号玻璃保温杯从茶馆的小锅炉房里溜了出来，把杯子往堡坎上的长条青石栏杆上一放，随手抓起一把塑料凳子，手掌卷回来，抓住西装袖管的角儿，胡乱地擦了两下，一屁股坐下来，招呼了挑子，扔下钱，那挑子便把白糕和豆汁使力抛了上来。六娃子惊险地接了，缩了颈，边吃边看街上的景。

他个头不高，西装对他而言大了些，衣裤接触桌凳的地方已经光了，大抵是因为脏，又长期磨，脏兮兮的，散发着霉味。不过比起他的头发来，还是略逊了一筹。他的脸黯黑着，像是井下挖煤留下的印记，永远洗不干净似的。颧骨边上长着一颗黑痣，嘴角永远挂着两撇不对称的小胡子，牙齿因为长期抽烟喝茶而变得暗黑，嘴唇有些发乌，似乎有些营养不良，与他那被烟熏得蜡黄的手指倒很是相配。他原在县冰糕厂上班，当运输工，三十六岁的时候，厂子垮了，找了几件事做，终不长久，后就一直在茶馆泡着，晃眼快十年了。当家的一应生活，是他再婚娶的下岗女工阎翠操持，那女人长得矮小敦实，伶牙俐齿，在团结村的街口上卖菜，有时六娃子也过去帮帮忙，下菜，上架。不过他很少在摊上坐，一俟把蔬菜弄好，就溜了，阎翠也并不狠骂他。

他坐着的这堡坎有十来米高，面对着同心广场，处于广场的东边。这广场有二三万平方米，装得下七八千人，乃是城市的中心，北面有一座大礼堂，堂前十几步台阶，原是传达中央精神兼开批斗大会的地方。约莫十年前，每年都有枪毙人的好戏看，死刑犯被五花大绑押到这里，被厉声宣布了判决书，然后被人山人海簇拥着押往长江边的芦苇荡枪毙。南边是县运输公司的始发站台，嘈杂而脏乱。西边有一条步行街，密布着几家百货公司和超市。一句话，这同心广场处于县城两条大街的交会处，是最热闹之地。如果六娃子稍伸出头去，可以看到堡坎底下一条南北走向的懒阳坡，约三四米宽，隔二十米三级梯步，有七八十米长，连接同心广场和团结村，坡顶分路，往左是闾巷，住着上千户居民，早晨光景，便是家家户户洗罐子倒夜壶的盛景；右边有一座小山岗，是县文化馆所在地，早已搞起第三产业，岗顶上的文化礼堂八十年代中期被拆了，改名文化大舞厅，每天晚上霓虹闪烁，来此跳舞的客人络绎不绝，争风吃醋的事天天上演。

茶馆正在小山岗的余脉，恰处于伸向广场的石嘴儿上，居高临下，广场发生的一切，一览无余。

懒阳坡上盘踞着大名鼎鼎的团结村，方圆有五六个足球场大。当清川城还是小场镇的时候，来自周边讨生活的人最先在这里杂居下来。他们先是搭着窝棚，在窝棚的四周挖一条沟，搭上破石板，作下水道，泥地上铺了青石板，便有了路，而后一些条件好些的家庭便起了穿斗房子，覆了瓦。当初，在那斜坡地上还有几畦菜地和十来座孤坟，而后，更多的人涌进来，吊脚楼也立起来了，瓦房像鱼鳞一般弥望过去，找不着一丝空隙，房子紧挨着房子，闾巷之间的小道像一条缝似的，得把抬大件的下力人累个半死。碎石子路也修起来了，雨天淌一路的

泥浆，四米宽的小马路也没法会车。四五年前才终于修成了沥青路，成了交通主道，在团结村中间分了岔。十字路口便是菜市，每天早晨，先是三轮车送菜的轰鸣，继而人声鼎沸，沉睡的居民半夜便听到外面菜贩们的讨价还价和下菜的声音。八十年代后期，临街的街坊开始修起两层楼房，上面自住，下面的门面租出去，进城的农民很快占领了这里，面馆、发廊、米铺、烧腊铺、裁缝店、按摩推拿店把一条街塞满了。

当年居民区里还有一家集体木材厂，每日里锯刀刺耳的尖叫使居民们不堪忍受，他们团结起来将厂子赶走了。还有一家集体企业窗钩厂，当沿海制造业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便难逃覆灭的命运，以此为生的人便失了业，拿着微薄的救济金，守着他们的屋子。

整个巷子的居民，成分复杂，既有早年离退的南下老干部，亦有拖儿带女的进城务工农民，间或还有外省的乔居者，城镇居民倒是居多。穷街陋巷，治安自然不佳，吸毒者有之，偷摸者有之，充斥其间的发廊，开着粉红色的暗弱灯光，吸引着清川的风流子。人杂乱，也普遍贫穷，除了宅基，他们不怕政府拿走他们家里的物件，因此，街道干部闻之心惊，极不愿去做工作，认为他们又臭又硬，不好教育。当房地产的春风乍起之时，开发商看着这些满眼冷漠的居民和满街的小门面，无不摇头而去。政府请了几拨人来看过之后，也不得不暂时死了心。于是便有了高楼大厦包围团结村的盛景，地处最繁华的闹市，却是成片的破瓦房，全城人笑称这里的居民是最富有的人，都是独家独院，家境好起来的人家搬了出去，再不想过每天洗罐子倒夜壶拾液化气瓶的生活。新的人流又充塞进来。

贫穷的居民们却甘之如饴，他们抓住房前屋后的每寸土地养鸡养狗，牵起了丝瓜藤，种起了木耳菜，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自信不输于桃花源里不知魏晋的遗民。他们每天的娱乐，便是中午和晚上满街飘菜香的时候，端了小凳在花架下吃饭，隔着几块破砖头砌就的矮墙，吹着荤素不等的笑话，遇着隔壁邻居才煮了香肠腊肉，便端了碗，大咧咧地径往人家厨房走，去夹案板上又肥又薄的腊肉片，那主妇总要为他多切一截肥香肠塞在嘴里，让他满嘴溢着油高兴地出来。自然，逗弄邻家的婴儿是免不了的玩乐功课，男人会对不肯吸吮母亲奶头的小孩叫道：“还不吃！再不吃我吃了哟！”引来年轻妇人的笑骂。还有一种娱乐，就是一瞥晚上飞驰的摩托上驮着的年轻妖艳的女子，不管夏天冬天，她们都在摩托车后座上展露着或粗或细套着黑丝袜的美丑不一的腿，目标是小山岗顶上的文化舞厅，如果说这也称得上是娱乐的话。

时间还早，茶老板老石兀自清扫屋子，他先是把地上的棋子一颗颗挑起来，捡进筲箕，再扫烟头、烟盒、塑料袋和撕碎的川牌，末了，把拖把在水槽里使劲地荡，再狠命地拧了，在地上用力拖。因茶馆内口痰鼻涕甚多，糊在地上，须得用力些。他戴着一副仿玳瑁眼镜，镜片发着昏黄的光，把他的脸映得越发的黄了。他的脸有些偏长，又偏瘦，脸颊上的肉有些凹陷，颧骨愈发显得突出。他拖了几个来回，汗已出来，索性脱了外衣，只剩手工钩制的毛线开衫罩在旧衬衫上，露出精瘦的身板儿。他要把大屋的地拖了，再收拾外面坝子上的垃圾。

茶馆外有声音了，陆续进来些人，都是老茶客。老石也没急着打招呼，进来的都各自落座，相互散烟，叫喊面馆子的丘二，谈天气，

再上厕所。大多数茶客的头泡尿都撒在了茶馆那黄金绀色的简易便池里。勤快的，自去茶柜寻茶。

这茶馆归文化馆管的时候，远近闻名，在全县称得上最大，也是县围棋象棋俱乐部所在地。一厢大屋里坐二百来号人，烟雾蒸腾，麻将声、吆喝声、贩卖声、争吵声，众声鼎沸。现在败了，这间长梁通屋被文化馆隔了多间，包了出去，改了餐馆、发廊和米铺，就剩下南角边上最后一个角凶，仍作茶馆。围棋象棋俱乐部的招牌还在，稀稀拉拉有二三十号老茶客。本有一家餐馆出高价要包的，被老石的妹妹石玉瑛到处托人，请到公安局副局长于坤剑给文化馆的馆长说了情，因得保住。

这茶馆有一样好处，乃屋子外面的堡坎，坝子上摆着几副石桌子石凳子，栽了几棵银杏树。在园子的东头，有一棵大黄葛树，差不多长了百年，枝繁叶茂。天气好时，茶客晒太阳玩牌下棋，掏耳朵，玩鹤哥，斗画眉，聊天，居高临下，与同心广场上的人对望，别有一番情趣。因此，虽装饰简陋，却三教九流都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茶客们虽三二十个，却也是各有堆头。有钱的、一官半职的喜欢在一起吹牛，无职无业的低收入人群聚一堆，但区分并不明显，毕竟这茶馆里的茶客多自小在团结村长大，彼此熟识多年。天晴时，茶客们喜欢在外面的坝子玩耍，逢着雨天，就猫在了屋里，果然是块喝茶的宝地。有私下摆老实龙门阵的，在坝子东角的黄葛树下，因那里有一堵高墙，不怕别人听见。

徐半仙也进屋来了，茶客背地里称他“半驾箕箕”，乃“半仙之份”之谐。他在老石处租了一块地面，摆一张桌子，桌上吊一个幌子，放一个签筒，摆一条板凳，就是他算命的摊子。老头子七十岁了，无

子无女，颌下挂一绺白须，颇有些仙风道骨。他从不参与茶馆的吃茶聊天，桌上摆了笔砚，没顾客的时候就翻翻《麻衣神相》，要么就写几手字。

再过半个小时，又来了几人，往六娃子边上一坐，分别是庞建军、钟魁智、张友生、苏络腮、梁富相及唐疯儿等人。与六娃子一样，都是厂里破产，庞建军来自清川玻璃厂，钟魁智来自县供销合作社，张友生来自清川钢铁厂，苏络腮来自县蔬菜公司，唐疯儿来自街道窗钩厂，梁富相跑联防，都是些高不成低不就没事干的人，在茶馆这地面上殊途同归，这些下岗人自然打得拢堆，一起喝茶谈天。

苏络腮把鸟笼子的布去除了，给笼中的鸚哥添水换食，那雀儿便婉转地学起了人声，“卖米哟”“自抠”，引得众人笑，茶馆一天的生活便开始了。

“嘿，六娃子，脑壳像遭霜打的茄子，哪个今天没啃鸭脚爪子了哇？”钟魁智笑着打趣他。钟魁智五十六七，圆脸，不修边幅，胡子乱冲，脑顶也谢光了，只剩下边缘几缕长发，把脑袋胡乱包起来遮丑。他早几年办了内退，天天在茶馆泡着下棋会友，老婆来吵了几回架，离婚走了，他倒真个儿把茶馆当家了。他是清川县第一高棋，还兼县围棋俱乐部教练。

“钱都输光了，你少来洗涮。”六娃子头也不回。

大家正在笑他，只听得“叭”的一声响，回头看时，老石把一把塑料椅子掰断了。

“这生意还有啥子做事哟！椅子天天烂一把，板板钱都收不齐，天天清早赶来抹屋帚地，白烧些开水，还要贡献茶叶。算了！明天把

茶馆关了，回家吃低保倒还清静些。”那椅子没断的腿倒折不断，老石伸出脚来，又踩了几脚。

大家面面相觑，都有些不自在，老石自顾自地吵了一会儿，也不再多说，把一本揉得破破烂烂的小学生习字本拿了出来，那上面记着他的账，拿了计算器自个儿摁着。

大家不作声。庞建军犹豫了一会儿，伸手从白西装里摸出了皮夹子来，抽了一张二十元的票子，走到老石跟前，把钱扔在石桌上：“老石，这段时间天天在这里清耍，你把这钱先捡到，权当是份茶钱。”老石忙站起来，把钱往庞建军手里塞：“你多心了，哪里是说你哩！我是说有些喝茶的不自觉，坐就坐，身子歪起撇起，你说这凳子经得起几坐？”那庞建军左推右挡，只是不接，两人相互推了一会儿，老石就把钱收了。

因是早晨，客人还不多，大家都在堡坎边上看广场。一会儿，一辆摩托把一手提菜篮的老妇人挂倒了，那老妇斜躺在地上，手死死地把摩托司机的脚拉住，那司机本想溜，周围又来了些看客，便没法。那妇人与司机扯在一起，吵嚷起来。

“白律师，你的业务来了。”六娃子抿着嘴笑，向坐在另一边的一个胖子打招呼。

那人正与贩煤的小老板牛奔商量事情，闻声抬起头来。他的面相看上去和善，腮边上的肉圆滚滚的，额头有些光亮，头上微秃，厚唇、肥鼻、弯眉，脸上没有起棱的地方，戴圆边金丝眼镜，衬着里面的鹿眼睛。那眼睛盯人专注，人说不上气宇轩昂，但眼光却有棱角，看上去四十五六的样子，穿一件红色的花衬衫，却套着黑色西装。他敏锐地往广场看了一眼，回头望着六娃子笑了，并不生气。

“你还不快点去，有啥不好意思？莫跟钱过不去。”六娃子假装正经地说。原来那白其富原也是自幼在团结村长大，从厂里退职后常在法院内外晃荡，识得多位法官与警察，揽讼写状，说事过钱。团结村但凡家里有灾有难的，都习惯来找他，凡贡献了的，多少都有说法，倒真不是吹的。大家都传他网网宽，很有些名气，茶客就笑称他为白律师，他也乐得认了。六娃儿无聊，不过拿他开心。

白其富站起来，说道：“六娃子，信不信今晚上我把你屋头堂客哄来睡了。”六娃子笑着说：“你去，我不阻拦，明天到茶馆来大家检查，看你还有屁在下面甩没得。”大家笑了。白其富上前，两人假意挽了一会儿。

正闹着，就听见庞建军说：“你们看那边，四宝儿又出来做业务了，正在打眺。”大家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三百米开外，正是汽车站，果见一个驼背儿，在人丛中光着一颗大脑袋，特别醒目，臂下夹一个皮包，后面跟一女人，在车站入口处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四宝儿原名冯保，因在同母异父的兄弟中排第四，故街坊唤他四宝儿。

“那婆娘好像不大认识，”唐疯儿眼睛好，“狗日的又换了一个新马子。”

“别个野婆娘都找了万百十个了，哪像你，恁大一扇，走起路来脑壳要顶到门框，几十岁了，女人下面啷个长的恐怕也不晓得。”说话的是张友生，身材瘦小，他坐在边上，把瘸腿伸直了，从洗得干干净净的灰白色的外套里掏出香烟来，自个儿点上，深吸了一口，抢白了他一句。县钢铁厂垮掉之后，他又做了几次临时工，不幸摔伤了腿，索性把残疾证每年二百元租给别人摆烟摊，便在这里厮混，因少年时受过名家指点，依靠在茶馆下围棋赢一点彩头补贴家用。

“放你的屁，老子玩女人的时候，你瓜娃子还在哪个爪哇国吃糖巴鸡屎哩？”被当众数落，唐疯儿脸上一阵青白，立即反击。

众人就笑了，原来那张友生已五十岁出头，唐疯儿才三十四五岁，“唐勇峰啊唐勇峰，硬是个刘全进，疯儿的绰号硬是没给你取拐。他踢屑你，你要恁个说，我正好讨你屋头的黄花闺女嚟。”说话的是老蒋，不知哪个时候进来了，出语指点。他一头花白的头发很是耀眼，中等个头，身体很结实，只是肚子发福了，高高地挺出来，性格爽朗，说话总是大声武气。

“张友生，你的业务，老顽童来了。”六娃子笑着说，露出了黑牙。

“业务，五块钱一盘棋也叫业务？老石的板板钱都挣不起哟。”张友生有些不屑地叹息。

“老子就是天天输你十盘八盘，你总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老蒋半是自嘲，半是气愤地说。他两个是老对手，老蒋棋瘾大，水平差，退休工资缴给老婆后，剩下的零花钱就用来下棋，基本上都捐献给了张友生。两人对弈一次，总要下十三四盘，老张让他四子，输得惨的时候，五子也让，但他总不服输。

两个人不再多说，往一角落走去，边走边唤老石拿一副围棋来，唐疯儿慢慢地踱了过去。

“走开些，最烦你这种闹宴的人，昨天那两三盘棋，你不在旁边干闹，蒋矮子他认得倒嗦？”张友生没好气地说，边说边把两个花里胡哨的袖筒子往外套的袖子上捋。这件外套是他唯一体面的衣服，下棋时手支在石桌子上很快就会磨烂。

“那我们把钱码起！把那两盘棋重下，一作十，你看老子认不认得倒棋！”老蒋青筋一下就鼓起来了，作势去兜里摸钱包，下赌注。

这样的吵嘴在两人间稀松平常，从来都没有当真过，旁人也只是笑笑。两个人噼噼啪啪，不一会儿棋盘上就落下了几十颗棋子。

又来了几位，都是老客，有县人民医院的徐国泰医生，开建材店的曾伯祥老板，文化馆的歌舞教习孙如玉，县精神病院的伊尹院长等，这几位麻将打得大，老石忙安排麻将和长牌。

一会儿，孔祥贤也来了，他头顶上留着些许纤细的白发，老年斑在他白皙的脸上留下斑斑点点，穿着一件银灰色外套，一手提拐棍，一手拿了《参考消息》，慢慢地挪步进来。老石忙打招呼，把他的专用藤椅端到坝子上，服侍他坐下来。老孔戴了老花眼镜，也不与人打招呼，自个儿看报纸。一会儿，老石把他的玻璃杯端过来，笑着说：

“老部长，你这西湖龙井硬是香哦！我冲下去就闻到清香味了！”

老孔说：“还不是我大娃儿拿给我的，我哪里有钱去买恁贵的龙井茶喝。”

老石又到坝子上张罗起来：“老钟、疯儿、六娃子、络儿胡，闲起干啥子，把场合儿扯起来噻，打一圈老麻雀。”几个人都不动，说人都凑不齐。

“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喊一个角儿来，都坐上来，我先顶一会儿，场子不要冷了。”老石极力唆使，自个儿把桌子搬到了外面，铺了桌布，一个个来拉。

拉到六娃子的时候，六娃子不肯，老石抓了他胳膊：“来来来，今天努把力，把昨天的损失捞回来。”六娃子把手臂拽回来：“我昨天打得两个包包一般重，你说该哪个打？”

正说着，只听外面一阵喧哗，隐约听得茶馆外街上有男女吵嚷之声。男的高声呵斥，似隐隐传来的巨雷，女的则是忙不迭地喊冤叫屈。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位高大男子进了坝子，金刚脸，脸上微有些泡肉，头发长得很密，却已花白了，穿一件深色便装，左手拿一根牙签，右手端一个不锈钢茶杯，涨红了脸，剔着嘴里的菜渣，往外边吐，把眼左右睨着，似大罗汉行路，稳稳地走了进来。

走到众人跟前，嘴上还骂骂咧咧：“罗琼花开的馆子，就是一家黑店，老子今天吃二两牛肉面，挑起来一看，妈的，牛肉才两三坨，你们说是不是黑店？”他对着钟魁智几个嚷道，几个人听了，都没有搭腔。

老石便笑道：“老雷，正说着三缺一呢，上来和几番牌，顺顺气，赢了钱，中午好好点几盘菜，那王锅铲新请了个锅儿匠，爆炒腰花和烧白硬是做得巴实，等会儿我给你喊去，再来半瓶江口酒，中午在太阳坝下面睡个瞌睡，包你今天安逸。”

老石招呼的老雷名叫雷三泰，片警。他并不理会老石，用拿牙签的手，指着钟魁智、六娃子、疯儿、庞建军、苏络腮等：“这里、这里、这里，不是人啊？”

老石把他的茶杯抢过来，往里掺了开水，放在牌桌上，恭恭敬敬地两手伸过来，把他两只胳膊扶了，死拉硬拽，才把雷警察扶到桌边坐了。雷警察坐上桌，把牙签斜插在嘴角上，自个儿把麻将牌拿在手里来回搓：“打一会儿就打一会儿，我雷某人还怕你这几爷子么？先说好哈，不打欠账！”

老石又堆了笑，挨个儿去请，勉强把钟魁智、唐疯儿拉上桌，那六娃子说没钱，老石从包里摸出三百元，塞到他手里，“你哪个不输

钱嘛，还没有坐上桌子，就想到输，记得哈，今天借你本钱。”那六娃子犹豫一番，经不得老石一阵拖，壮了胆子，坐上牌桌。老石又忙着张罗，招呼徐国泰等人，“徐医生，曾老板，闲着做啥，坐上来敲杯。”拉他们上桌。

外面传来轰鸣之声，有摩托在门外停了，须臾，进来一位汉子，国字脸，脸颊上的肉深陷，穿一件迷彩服，头发被风吹得倒向一边，脸上有两处开了冰口，手里拿着一双皮手套，进门向老石要了茶。庞建军便道：“方刚，到这边来坐。”两个人原是工厂里一个车间的，庞建军做的是统计，是个干部，比工人多拿三四百元，郑方刚在机器上做工人，厂里效益差，压缩编制，庞建军后台不硬，改成了工人，就干脆从厂里出来了。郑方刚还在车间一线做事。

两人坐在石栏杆边上，郑方刚用手理了理他头上的乱发，庞建军递过去一支烟：“业务跑得怎样？”

“跑起累，你看看那满街的摩托，比三清山上竹林里的蚱蜢还来得多些。”他把手指向广场边上，几个路口都停着六七辆摩托车，“从早晨六点跑到现在，拉了四五个人，挣了二十块钱，下午四点还要上中班，歇一歇，免得上班晕瞌睡。你呢，不打牌，干坐？”

“我坐着不就是在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么。”

“哦？你在哪里找到发财的路数了？”

庞建军吹了吹落在皮鞋上的烟灰，那皮鞋擦得锃亮，一尘不染：“我在这茶馆，上一回桌子就要输脱七八百。前月，坐上去十次，赢二场，输六七场，平一两场，哪个月不输上五六千块。现在我不打了，光看，不是每个月挣个几千块啊。”郑方刚哈哈笑了，连称有理。

郑方刚把庞建军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庞建军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脸上收拾得整洁，白西装熨得笔挺，只是脸上皱纹比原来多了：“你还是老样子，跟在厂里一样，还是恁个讲究，没想到外面去发财？”

“发财？你不找到靠山发哪门子的财？做哪样不靠关系？没得关系这老石的小茶馆都开不下去，现在我老婆还挣得几个钱，我早晚给娃儿做饭上学，将就混。”

郑方刚说：“你老婆燕清婉能干是出了名的，她挣的钱应够你花了，还是你福气好啊。我老婆跟我离了，她在北京待了三年，就春节回来看一看娃儿，说走就走了。这娃儿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又当爹来又当妈，我跑摩托给自己挣点饭钱和烟钱，后年娃儿考高中，看他自己了，我哪里有钱交几万的赞助费？”两人又扯些厂里的人情世故，哪个死了，哪个又在何处谋事等等。

老石这才可以静下来算他的烟茶账。他的这个茶馆可谈得上苦心经营，因为茶钱甚为低廉，大多数茶客都爱泡一块钱的碎末花茶，主要收入是麻将牌、长牌及象棋围棋的租赁费。以小时算价。茶馆的屋角还有一张桌子是租给徐半仙的，他一个月交他三百块的租赁费，这样算起来，他的茶馆好的时候能有一千五百元，差的时候也就八九百元，所以他样样都精打细算。

这个时候，从茶馆屋子里出来一位年轻人，额头高耸，眼睛因近视而有些茫然，一看便知是一位书生。他的头发纤细，偏长，把额头遮了一半，白净面皮，鼻梁挺直，薄嘴唇，颌下没有胡须，文质彬彬，中等个子，三十二三岁。穿着一件朴素的淡黄色灯芯绒外套，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挎着一个塑料包，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很有礼貌